

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 峥嵘生平 作者：吴健如（上）

我的父亲吴石生是老一辈先达人所熟悉的公众人物。他一向热心公益，毕生为先达的民主爱国事业奋斗，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起，父亲就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而积极发动先达华人同胞的募捐活动；抗战胜利后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，他为建立先达华侨总会，推动总会的工作而殚精竭虑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我的父亲于上世纪初，当他还是花季少年时，就随我的祖父飘洋过海，来到苏岛先达定居。为谋生计，他年纪轻轻，挑着货担，走街串巷，足迹遍及城镇郊区，贩卖一些日用品。经过数年的辛勤劳作之后，父子俩挣足了钱，便在榴莲街开了一家食杂店，取名为《建南兴》。我就出生在这家店里。当我长到两岁大时，由于交不起荷印当局的苛税“人头税”，祖父和父亲决定把我母子和姑妈吴丽娟三人送回国内龙岩老家。两年后方把我们三人又接回印尼。其间店里生意开始兴旺发达起来，家里经济状况也大有起色。

一、焕发爱国热情，投身抗日募捐活动，战后积极参与筹建华侨总会

在祖国爆发全国抗日战争以后，父亲和先达爱国人士一起，积极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领导的“南侨总会”的号召，在先达发起了爱国



1962年6月4日，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（前排坐者）与《光明日报》工作人员合影。后排左起：高天、王声严、陈此生、宋凉赞、谢公望、穆欣、孙捷、刘嘉启。

募捐活动，以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。他经常和同伴们手持写着抗战募捐的小旗，分组沿街挨家挨户进行宣传，动员侨胞捐款捐物，支援祖国抗战，不仅获得了广大侨胞的支持，收获甚丰，而且父亲及其同伴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侨胞们，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赞誉……

二战结束后，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。与此同时，苏岛华侨社会也掀起了民主进步的浪潮。在巴人等革命先驱者的指引下，各地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建立起青年、妇女、职工、工商等群众组织。但仍需要建立一个能领导民主进步运动的统一组织，这就是“华侨总会”。经协商与酝酿，在先达也成立了“华侨总会”。

父亲积极参与了酝酿成立华侨总会的过

程。华侨总会成立后，父亲担任总会的财务工作。总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各大商家的认捐。据我所知，父亲和他的同乡好友陈失因每次认捐的数额都不小。总会的经费开支都要经过他的手。诸如中华学校等华人学校、养老院等公益机构的经费，都经由他的手发放。

父亲秉性耿直，急公好义，口直心快，往往不顾情面，容易得罪人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跟总会财务部的另一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吵。起因是一笔公款支出的问题。两人因而闹得沸沸扬扬，结果在总会领导的调解下，此事终归了结，两人和好如初。

二、与巴人、宋凉赞等人的密切交往，积极掩护“反法西斯同盟”的战士

1942年12月8日，

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侵入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，苏东时局动荡，为了避难，父亲在日军到来之前，在离市区北部二十来公里处一一马达人村庄附近租了一块地，盖起了两座木屋。日军侵占先达之初，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迁往那里暂住。同时还动员自己的堂兄弟、堂姐三家和同乡好友陈并会一家人，也前往那里避难；加上我家总共近二十口人挤睡在一座木屋的通铺上。

九·二〇事件发生后，宋凉赞、伍焕赞和李国海，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，经父亲建议，躲藏到这个村子来。几个月后，巴人先生和刘岩先生也转移到这里了。

有一次，我和丽娟姑妈随父亲到村里看望这三位“反法西斯同盟”的战士。到那里

时，只见巴人在菜地里劳动。李国海正从河里挑水上来浇地，只有宋凉赞一人在屋里油印材料。丽娟姑带我进屋去找宋凉赞，父亲则留在外边跟巴、李二人攀谈。姑姑和凉赞的爱情就是逃难在泗拉巴耶村时建立起来的。

泗拉巴耶马达村里没有收音机，更不可能在那里油印。反盟的组织非常严密，“前进报”是单线传阅，不是分发。日本投降后头一个月，每天晚上收听广播，记录新闻。第二天由王谦宇刻钢板。

三、二战结束后巴人、宋凉赞等人继续为促进华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团结，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而奋斗

日本投降后，宋凉赞等革命战士从“地下”走出来，回到了先达市，投入到为促进华侨社会的进步，支持印尼的独立，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工作中去。

先达的民主进步势力接管“中华学校”后，郑子经先生和大批革命进步青年都到学校里来教书。宋凉赞担任初中一年级的级任，第二学年，宋凉赞因工作需要调到棉兰去。没有人接替他的工作。总会的负责人特地商请巴人先生出马，担任初中二年级的国文教师（当时是全校最高的年级）。巴人先生教学方式独具一格，具有鲜明的特色。他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课文，有问题先记下